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1.019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及其当代价值

殷瑛,于兰英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在革命文艺发展史上彰显了深刻的“人民性”,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即扎根生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思想,引导国民精神;饱含情感,激发心灵共鸣;树立理想,表达美好愿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期,对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认识和把握,有利于传承中国革命进程中经典文艺作品的优良基因,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文艺创作审美观的发展和中华民族革命道德观的塑造均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1-0155-07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由此明确了延安时期文艺作品“人民性”的立场和属性,并诞生了如《白毛女》《军民进行曲》《刘胡兰》《血泪仇》《兰花花》《秦洛正》《赤叶河》等一大批红色经典歌剧。时隔72年,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文艺的人民性品格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同时,其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探寻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当代价值,有助于深化和延伸红色经典歌剧的新能量、新魅力,真正做到“涵弄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①。

一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发展概况

延安时期是指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

这段中共中央“落户”陕北的13年,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即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②。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戏剧运动无疑在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的传播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在艺术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诞生了许多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歌剧。

早在20世纪20年代,以黎锦晖为代表的儿童歌舞剧拉开了西洋戏剧表演形式在中国本土探索和创新的序幕。从1920年到1929年,黎锦晖共创作了24首儿童歌舞曲目和12部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三蝴蝶》等,题材大多为中国传统的童话、神话,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语言通俗,朗朗上口,舞台形式是歌、舞、剧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表演,形成了“歌剧雏形”^③的戏剧品格。可以说,黎锦晖对这种综合戏剧艺术与本民族审美趣味相结合的尝试,对之后

收稿日期:2021-09-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BDJ082)

作者简介:殷瑛(1982—),女,湖南益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音乐学研究。

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34页。

②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③居其宏:《歌剧综合美的当代呈现》,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创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庚先生就说过:“我赞成新歌剧不只从秧歌剧时候算起,而应该从黎锦晖的《小小的画家》等算起。”^①20世纪30年代,随着左翼音乐运动和救亡音乐思潮的发展,音乐成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大批无产阶级革命新音乐被创作出来,成为延安音乐运动的先声。像苏区的音乐作品就已经具有了鲜明的革命性和群众性,有强调军队纪律的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表现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的《工农革命歌》,还有一些小型“歌唱剧”《苏区景》《血汗为谁流》等,这些音乐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文艺产物,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为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已经成为全民性热潮,人民的抗日呼声不断高涨。1936年8月,尽管民众歌咏会被国民党南京政府勒令解散,但救亡音乐的星星之火得以在延安保留并发展成燎原之势,全国各地的爱国音乐家如吕骥、冼星海、贺绿汀、马克、李焕之等开始汇聚延安,延安成为“歌唱的城市”。

但是,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情况比较复杂,长期积累的宗派主义和内部的思想斗争初显端倪,特别是戏剧方面的创作出现了脱离群众和实际生活的情况,演出的大多是外国文学经典,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习惯相去甚远,难以引起共鸣,也缺乏政治责任感,无法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会后,毛泽东将两次讲话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答了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两个根本问题,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熟悉群众、理解群众,转变自身思想来靠近群众,由此确立了延安文艺的“人民性”。

《讲话》后,延安迅速成了新歌剧事业发展的根据地,全国各地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汇聚延安,开始对传统民间艺术、戏曲和秧歌剧等进行全新的

改编和演绎,在1942年5月到1948年3月间创作了一大批耳熟能详、深受百姓喜爱的红色经典歌剧,特别是1945年根据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故事编撰而成的剧目《白毛女》,在延安演出后获得巨大的成功,在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红色经典歌剧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延安歌剧的成功经验进而传播和发展到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和大后方,先后诞生了晋察冀的《王秀鸾》《宝山参军》;重庆的《红梅记》;晋绥边区的《刘胡兰》;晋冀鲁豫边区的《赤叶河》以及《农村曲》《塞北黄昏》《军民进行曲》《兰花花》《血泪仇》等一大批红色经典歌剧。这些红色经典歌剧体现了革命性、人民性和艺术性高度融合,成为中国文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内涵

何谓文艺的“人民性”?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人民性是文艺作品“反映广大人民思想、生活要求和愿望的特性”^②。文艺的“人民性”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1778年,赫尔德在《诗歌中各民族的声音》中首次提到“人民性”,但此时的人民性与民族性基本没有界限。1819年,俄国诗人维亚捷姆斯基在写给屠格涅夫的信中,也提到了“人民性”的问题,随后,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一文中对“人民性”进行了“民族性”“民众性”意义上的阐释:“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为本国同胞赏识的优点——对于别人来说,它要么不存在,要么可能是一种缺陷。”^③“在悲剧中展开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人和民众——人的命运和民众的命运。”^④后来,别林斯基在继承普希金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人民性是对最底层人物生活的忠实描写。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将人民的理解拓展为“男人、妇女和儿童”^⑤，“是指与旧的统治者相对立的革命群众,属于社会的大多数”^⑥,并提出文艺要为这些

①张庚:《新歌剧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在新歌剧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剧本》1957年第4期。

②《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51页。

③普希金:《论文学中的人民性》,载《普希金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④张铁夫:《再论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⑥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革命群众服务的美学观点。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提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并且要“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必须结合这些群众感情、思想和意志,并且提高他们”^①。总的来说,俄国文艺界所理解的人民性更多的是强调人民的集合性意义,这成为我国延安时期文艺“人民性”的重要思想基础。

延安时期文艺作品的“人民性”是在《讲话》的指导下凸显出来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次提到“人民”一词,他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强调了人民的“广大性”“阶级性”,突出了阶层之间的联盟关系,具有浓郁的政治性意味,而此时的“人民性”就拥有了一种集合性的底色,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诉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以《讲话》为依据,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包括四层含义:第一,源于人民,创作者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创作素材源于人民真实的生活,是人民真正关心或对生活有意义的,“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第二,为了人民,把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第三,依靠人民,通过群众的力量来塑造人物形象,通过群众的眼光来评价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第四,服务人民,创作的作品服务于人民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体

现出高尚的审美品格和革命道德精神,使欣赏者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同时得到思想和情感上的升华。“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作为当时解放区最受欢迎的文艺形式,将“人民性”巧妙地融合在创作和表演里,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

(一) 扎根生活,讲好中国故事

扎根群众、扎根生活,是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第一个特征,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由之路。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之前,不少文艺工作者选择用纯文艺的东西来展示自己,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时代,不仅当时在延安的老百姓看不懂,而且作品也无法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比如歌剧《白毛女》在创作初期并不顺利,“前三幕在大操场上连排时,全院师生员工反应冷淡,不少人不时皱起眉头,窃窃私语的议论,戏演完了也没有人鼓掌”^②。大家认为剧中的喜儿和农民的形象不符,中不中、西不西、今不今、古不古,成了“四不像”。后来,贺敬之、丁毅及马可等艺术家在重排时选择从人物的生活出发,将叙事重心放在了杨格庄的佃户杨白劳和其女儿对地主黄世仁的仇恨以及顽强斗争的精神上,在故事性上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在形式上也选择了人民群众熟悉并容易接受的表演形式,比如用大家都能听懂的普通话作为对白,演唱素材均源于当地民歌和河北梆子曲调,使观众们倍感亲切,成功地塑造了一部经典歌剧。刘白羽先生这样形容当时歌剧演出的情形:“他们踏着轻盈的舞步走到广场上来,他们是那样光辉,这光辉,引逗着观众的视线,打动观众的心,观众为他们的灾难落泪,为他们的胜利鼓掌,他们把千百万群众心里的话,响亮地歌唱出来。”^③

(二) 传递思想,引导国民精神

鲁迅先生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④

①列宁:《列宁论文学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7页。

②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③刘白羽:《新的艺术,新的群众》,《群众》1944年9月30日。

④《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延安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还体现在每部作品都有着崇高的立意追求,在扎根生活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提炼出高于生活、超越生活的时代精神和伟大思想,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提升人民的思想境界,坚定人民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决心。如歌剧《刘胡兰》中传递出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革命精神,《白毛女》中表达的“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主题,等等。歌剧中的角色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来,又通过艺术形象推广开来,成了革命思想的传递者,获得了直接引领人民精神的力量。

(三) 饱含情感,激发心灵共鸣

延安红色经典歌剧的创作就是通过将作品里的人物放在特定的语境中,融入对当地生活的体验和对地方性文化的理解,塑造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角色,并通过音调、节奏和旋律风格等表达人物情绪,增强戏剧性效果,来促成情感共鸣。因此,作品里每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角色,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饱含情感,并通过艺术化的表达释放出来,引导观众感同身受,获得审美体验的升华。1944年,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和九军分区前哨在创作歌剧《血泪仇》的时候,演员们为了吃透剧本,不分昼夜对剧中的角色进行揣摩,对每一句念白和唱词进行反复演练,情到深处,伴奏的老琴师边拉边哭,大家深陷在这种阶级仇、民族恨中无法自拔。正式演出时,台下的观众也是哭成一片,对剧中河南老农王仁厚一家的悲惨命运唏嘘不已,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汉奸的罪行无比仇恨。演出后,人们纷纷采取行动,有青年一散戏就报名参军,有夫妻背上军鞋就去支前,歌剧这种艺术形式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传播革命道德、鼓舞革命士气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 树立理想,表达美好愿望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还体现在树立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伟大理想并表达对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上。歌剧《刘胡兰》中的经典唱段《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是刘胡兰送别心上人王本固和其他子弟兵们所唱,由不同感情色彩的ABC三部曲式构成,其中柔和抒情的A段通过

宽广的音域和大起大落的旋律进行,描绘了祖国的壮丽山河,暗喻了刘胡兰豁达的胸襟;速度加快、力度加强的B段则着重表达了刘胡兰坚定的革命理想;变化最大的C段通过情绪、力度和气息的控制突出重音和高音,表达了“风会停云会散,阎匪总会消灭完,等着吧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再相见”的美好愿望,使欣赏者备受震撼和鼓舞。被称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先生创作的歌剧《军民进行曲》从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朗朗上口的民谣风格和真实感人的故事情节,艺术感染力极强,成为当时国统区影响力最大的一部经典歌剧,激励着人民群众为了美好生活英勇战斗的信心和决心,是一次“中国气派”在歌剧创作中的成功实践。冼星海谈到《军民进行曲》的创作,认为“我们不独要把握歌剧要有‘艺术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深刻含义,我们还应利用这三种条件去领导全民族,使他们通过歌剧感到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去增强抗战的决心”^①。

三 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人民性的当代价值

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承载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信仰和革命精神,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责任担当,再现了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英雄形象,这些作品中所彰显的深刻的人民性,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价值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中蕴含的人民性,应该说为新时期的歌剧改编和创作提供了示范,其中铸造的关于人性、人情和人格的经典审美形象,具有高度的象征化色彩和魅力,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创作资源。一方面,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红色经典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其再利用成了国家重塑集体记忆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各种价值观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冲击和颠覆,信仰危机和怀旧情绪接踵而来,红色经典的强势回归成为必然。

^①冼星海:《我对于创作歌剧〈军民进行曲〉的一点意见》,载《冼星海全集(第1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上具有促进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前期,文艺“人民性”出现了隐退与变异的特征^①。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虽然在文艺界重新掀起了一股改编经典的热潮,然而对红色经典的重述和改写,却一度陷入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漩涡,红色经典成了消费主义的牺牲品甚至是恶搞的对象,其中的人民性非但没有得到彰显,反而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习近平就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②特别是当下在互联网上流行的文艺作品中,“历史常常是被颠倒了,民族常常是被丑化了,国家常常是被践踏了,文艺失去了民族脊梁和时代魂魄,显露出一派雕琢面孔和卑陋神态”^③。

针对这一情况,重读、廓清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中的“人民性”,讲好“中国人民为何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何以救中国”的革命故事,彰显“自由、平等、公正、爱国、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重新鼓舞和激励当代的中国人民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习近平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④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对人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建构是通过民间叙事、生活叙事来完成的,表达的是为了美好幸福生活而拼搏和奋斗的情感,这种深入生活的艺术形式在人民群众中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他们喜欢听、愿意学、能够唱,像《白毛女》中的经典唱段《北风吹》《扎红头绳》《我要活》,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据不完全统计,歌剧《白毛女》创作至今,在国内外的演出已超过

一万次,观看人数已超过数亿,并被改编成电影、舞剧、戏剧等艺术形式,在当代仍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能够给予人民群众正确的思想指引;像《军民进行曲》《宝山参军》《无敌民兵》等经典歌剧可以让当代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体会到现在的生活多么来之不易,感受到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正能量,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此外,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经典歌剧以贴合群众生产、生活的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了“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男女平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引导和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精神。因此,延安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拥有长久的生命力,成为经久不衰的精神滋养,能推进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领悟,建构起核心价值观和人民情感高度契合的集体认同空间。

(二)在当代文艺创作审美观的发展上具有纠偏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艺社会学”影响,我国在文艺创作特别是大众文艺创作上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影响着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在文艺创作审美观上,也呈现了不同以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是,一方面,在“快餐文化”的影响下,为了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当代一些文艺创作以“时尚化”“商品化”为准则,自身的审美属性被消解,审美观被扭曲,创作的作品“往往与文艺的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等倾向不谋而合,消解思想价值与精神引领,单纯追求产业商品趣味,还有平面复制、广告植入、‘夸示性’消费等,这已使文艺的人民性向度的思想内涵与审美原则遭受干扰和扭曲”^⑤。另一方面,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不少中国当代文艺创作者患上了“失语症”,也鲜有人愿意走进基层民众的生活中进行体验和创作。“文艺对人民大众与现实生活的关注不断降低,

①冯美:《新时代文艺“人民性”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构建——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人民性”的话语实践为考察中心》,《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③姜春:《新世纪文艺人民性的理论诉求》,《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4期。

④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

⑤刘渠志,赵凯:《文艺人民性内涵的时代思考》,《学术界》2016年第8期。

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力度不断减弱,有的甚至模糊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界限,出现了这样那样脱离人民的不良倾向”^①。

在这种审美观严重偏离的情况下,通过对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中人民性的传承,可以检视和矫正当代文艺创作中存在的审美观扭曲现象,引领当代人民群众的文艺需求和审美趣味,因为其中描写的“永远的楷模”在今天仍然能激发人们的心灵共鸣,即便身处不同时代,我们仍能从这些经典中体验到相通的审美情感,体验到人性的善与恶、卑劣与崇高,体验到自身命运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的使命感,激发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和对现有美好生活的珍重^②。如2019年6月30日,川剧《江姐》进京演出,江姐扮演者沈铁梅对人物心理进行了深度刻画,如在要见到丈夫时的羞怯、在丈夫遇难时的悲痛、对丈夫的追忆等细节上的描写上入木三分,塑造了一个更完整、更真实、更感人也更具“人性魅力”的英雄人物,其中既有“小我”的情怀抒发,又有“大我”的精神追求,“大我”与“小我”相互交融,合为一体,使观众获得了完整的审美体验,不愧是一部有血有肉、感染人心的经典作品,是“人民性”在当代传承的典范。《中国戏剧》主编罗松指出:“英雄人物不仅有伟岸骨骼,也要有丰满的血肉;有崇高的理想,也要有一己情怀;不仅有人性的超越,也要有世俗牵挂。当人性达到最美好的时刻,也就是人性和党性高度的统一。”^③

(三)在中华民族革命道德观的塑造上具有培根作用

列宁曾强调,人民艺术“永远贯穿着民族的精神”。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人们的精神需求日益丰富,而当代的文艺创作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④,很难彰显“向美向善”“美善相谐”的正面价值,无法解决如今的“道德缺失”“信仰危机”等困惑和难题。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道德形成发展的关键时

期,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歌剧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方式描绘了人民丰富多彩的世界,表现了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英勇不屈,把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品格、大公无私与团结奋斗的操守以及追求平等、自由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热望等等”^⑤革命道德观,以艺术化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显示出了强大的道德力量,其中闪耀的“人民性”光辉,在当代仍然有着培根铸魂、凝神聚气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些作品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感召力与思想引领力,总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绽放新光彩、释放新能量、彰显新魅力。”^⑥一方面,延安时期红色经典歌剧的人民性,表现在主人公为了“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不懈拼搏和奉献的精神上,展现出一种“民族性情感”和“道德性情感”的融合统一,具有“榜样作用”和道德导向性,如歌剧《无敌民兵》王登高、路长贵、何志平、张大发等一批游击健儿善良、勇敢、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揭示人民必胜、反动势力必败的深刻主题,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这些经典歌剧描绘了人民群众作为主体力量,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通过中国革命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情景,如歌剧《惯匪周子山》就是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反特除奸的经典作品,通过这种极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自然地激发了观众“感同身受”的崇高情感,能促使他们产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并能以同样的情感对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伟大成就。

结语

延安时期虽已日渐远去,但是延安精神永存,延安红色经典歌剧中内蕴的“人民性”永存。传承这些作品中承载几代人民群众集体记忆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血脉,仍然是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凝聚崇高信仰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①董学文:《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意义》,《求是》2004年第1期。

②闫德亮,李娟:《中国主流电影红色叙事考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③孙竹:《从经典到经典 重庆川剧院〈江姐〉进京演出座谈会综述》,《中国戏剧》2019年第10期。

④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⑤于兰英:《延安时期新歌剧的中国革命道德叙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⑥李掖平:《彰显超越时空的思想穿透力——谈“红色文学经典”的价值》,《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2020年4月8日。

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①。让我们从这些红色经典歌剧中汲取宝贵的营养,让“人民性”绽放出新的光辉,谱写出当代文艺复兴的新篇章。

On People's Character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Red Classic Opera During Yan'an Period

YIN Ying & YU Lan-ying

(School of Music,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red classic opera during Yan'an period shows a profound “people's character” in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 connot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aking root in life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transmitting ideas and guiding national spirit, being full of emotion and stimulating spiritual resonance, and setting up ideals and expressing good wishes. In the new era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people's character of the red classic opera during Yan'an period will help to continue the best genes of the classic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have leading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aesthetic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mor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Yan'an period; red classic; opera; people's character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4页。